

论侵害生命权之死亡损害赔偿

——“同命不同价”所引发的法律思考

● 吉莹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死亡损害赔偿并非对生命权本身的救济,而是对因侵害生命权所引起的各种现实利益损失的补偿。但是,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致使由于受害人个体情况的差异,同样的事故赔偿的结果却千差万别,进而引发了有关生命价值的新一轮争论。本文中,笔者将针对“同命不同价”的情况,探讨侵害生命权的死亡损害赔偿问题。

[关键词] 同命不同价/平等权/生命权/死亡赔偿金

200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农村户口居民在城市长期居住,并且涉及一些损害赔偿的诉讼判决问题。然而,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准来分别计算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导致城乡户口间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的死亡赔偿金,因而这一司法解释招致了“同命不同价”的疑问甚至指责。自《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以后,人民法院依据该解释对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作出了相应的判决,这些判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重庆市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案子引起了社会的格外关注。2004年12月的一天凌晨6时,在重庆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三个家庭意味着同样的悲痛。然而,给其中是农村户口的一名少女的赔偿,却不及她有城市户口的同学的一半,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仅仅是因户口上的城乡差异,这种差异使同一车祸中受害人死亡损害赔偿金出现天壤之别,这起案例也激起了对“同命不同价”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一、“同命不同价”争论引发的原因——平等权

“人人生而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企盼,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并正式确立了平等权。美国《独立宣言》明确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法国《人权宣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此后,公民的平等权被写入了宪法,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宪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公民权利的核心

内容。我国现行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首先也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然而,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第29条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来计算,这势必会造成由于城镇和农村户籍的差别而导致死亡赔偿金额的不同,这对于提倡平等、公平的社会来说就是一种不平等。舆论倾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司法解释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违反了《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民法通则》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法律规定。

在宪法学中关于平等权一章提及了“合理差别”原则,法律的平等权,既包含了形式上的平等,又包含了实质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在于反对不合理的差别,即没有合理根据的差别对待,比如根据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因素采取的法律上的差别对待或歧视方式。当然,因为人们必然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差别,如果在法律上忽视这些差别而加以机械的均质化,则反而会带来不合理。因此,实质上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合理的差别存在,即在合理的程度上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但是,在侵害生命权的死亡损害赔偿上,根据城镇和农村户口的不同计算出差别巨大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有其合理之处?是否违背了公平原则?

有人认为,死亡赔偿金并不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衡量,而是对于受害人未来可得利益的补偿,即对于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一种补偿。受害人的收入状况千差万别,如果不考虑收入的差异,所有受害人均按照同样的赔偿标准计算其财产损失,从个人付出的努力以及效率标准看,这是一种不公平。但笔者认为,从朴素的法理观念出发,按照城乡不同的户

口制定法律政策是违背自然平等的。首先,对公民进行户籍上的区分就是人为地将人与人之间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尽管城镇和农村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能会造成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有所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将这种差异扩大化,并在法律上加以肯定下来,这种差距会越来越来大,以至于无法弥补。其次,人是在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当中,人口一直处在不断的流动当中,那么,谁能肯定城镇和农村人口是不是改变呢?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农村户口,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一个城镇居民,或者说,在流动中,他(她)一直生活在城镇中,却拥有着农村的户口,他(她)一直按着城镇居民的生活标准生活着,到意外死亡的时候获得赔偿却完全不等价,这样难道就公平了吗?

二、生命权是否存在

生命权是否属于独立的人格权,民法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 否定说。该说又有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一种从支配权的角度,认为既然生命权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则应该是一种支配权,具备法律上的支配性,但是民事主体对生命的支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而不是法律上的支配,因而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必要。另一种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进行论证,认为“有权利就有救济”,不存在没有救济渠道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一种“权利”没有救济的渠道,就不能将其称为权利。在侵害生命权的情形中,一旦构成对生命权的侵害,被害人就因死亡而使其人格归于消灭,当然也就无法请求损害赔偿,所以生命权不是权利。

2. 肯定说。该说认为虽然《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但生命健康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而是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更有学者认为,将生命权确认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有利于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构建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强化对侵害生命权的救济,明确有关机构和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有利于确认有关生命伦理问题。

拉伦茨曾明确指出:“如果这里人们把对物的支配首先理解为权利人可以单独具有某种许可的话,那么,这种支配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法律的力’”,“‘法律的力’不适用于各种人格权”。可见,就这一意义而言,人格权尤其是物质性人格权是不具有支配性的,但这并不成为否认人格权为名副其实的民事权利的理由。因而,我们不能从有无支配性的角度来论证生命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没有支配性的权利也不妨碍我们将其称为“权利”。至于笔者为何在此讨论是否存在生命权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通说的前提下。这是因为:生命权在权利体系中,处于一个太过特殊的地位,其权利属性与其他所有的民事权利都不相同,因而不可等量齐观。如果无法对生命权做一个正确的定位,也就无法进一步探讨死亡赔偿金以及同命不同价的问题。

三、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和性质

死亡赔偿金是不法致人死亡时特有的财产损害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的界定取决于如何认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那么,死亡赔偿金究竟是对谁的何种损害的赔偿?各国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达成共识的一点是,死亡赔偿金绝非对死者的

财产损失的赔偿,而只能是对与受害死者有关的一些人,即近亲属的赔偿。因为受害人已经死亡,其权利能力消灭,民事主体资格不复存在,死者本身不可能遭受财产上的损害,加害人无须向死者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但关于近亲属所遭受的此种固有损害如何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学说:

1. 抚养丧失说。该说认为,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抚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因此丧失了生活的来源,这种损害应当由赔偿义务人加以赔偿。按照抚养丧失说,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抚养人在受害人生前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的分额。

2. 继承丧失说。该说认为,受害人倘若没有遭受侵害,在未来将不断地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本来是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从而使得这些未来可以获得的收入完全丧失,以致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将来所能够继承的财产也减少了,赔偿义务人应对这一损失予以赔偿。

两种学说相比起来,继承丧失说的优点在于判给受害人亲属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较多,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更为周到。但缺点在于:首先,继承丧失说中的推测性成分太重;其次,在受害人为卑亲属而由尊亲属继承的场合,因卑亲属的未来能够生存的期限长于尊亲属,因此死亡赔偿金就要比尊亲属作为受害人的时候多,显然不合理。而抚养丧失说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但是缺点在于判给受害人被抚养人的死亡赔偿金就较少,有时甚至可能会出现英国那样采取一个固定数额的做法。

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实际上采取的是继承丧失说,对于死亡赔偿金也可以界定为: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之法定继承人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未来可继承的受害人收入损害的赔偿责任。从这点来看,我国目前采取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理由在于: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致人死亡时赔偿义务人应当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责任,但给付的数额都非常低,规定死亡赔偿金可以弥补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不足。同时也纠正死亡赔偿的利益失衡,为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提供了可能性。

四、同命是否应同价

如前对于平等权的论述,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应该看到,平等并不意味着全体公民毫无差别的、完全的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并不在于描述一个事实,而在宣告一种理想状态。在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情况下,那种不计人类先天和社会属性上的差异的绝对平等观,最终可能导致对实体法秩序的全盘否定。所以对于个人特性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应在立法上予以考量,或者说,“差别对待”本身并不当然不具合法性,也即是“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合理的“事实上的差异”。然而,最高法院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却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引起争议,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影响死亡损害赔偿(下转第45页)

因造成的。有个小学生家庭父母不和,关系紧张,甚至到了快离婚的地步,这个小学生的心理受到严重冲击,她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因而造成心理障碍。

3. 生理原因:一些小学生由于智力超常或者智力低下,往往与他人显得格格不入,心理上也不能和其他小学生一样得到正常的发展,时间一长就有了某种心理障碍;还有一部分小学生,他们因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身体残缺,这使他们下意识地产生了自卑感和心理障碍。

三、思考与建议

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加强对小学生的心理指导,预防心理疾病的产生不容忽视。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这个群体的健康与否,预示着国家的发展是否处于一个良性状态,同时,小学生处于长身体阶段,有很大的可塑性,加强小学生的心理指导,可以尽可能减少未来的心理疾病人数,对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改善人口结构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良好的心理指导必须具备真诚、理解、尊重三要素。要依托有社会意义的背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

1. 要以真挚的感情,诚恳的态度和同学相处。与小生相处,首先要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活动如实反映出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使他们觉得我们是他们真正值得信赖的朋友,才能因势利导,在潜移默化中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因此,我们和他们相处,决不能虚情假意,失去信任,造成心理指导无从下手。

2. 要换位思维,要从不同的视角,与同学交换对问题的看法。心理有障碍的小学生,其对问题的理解、看法往往和别人不一样。理解他们,是能否和他们进行交流的关键。

3. 除了真诚、理解以外,还要注意对每个同学在人格上予以充分的尊重。

4. 做心理指导工作,方法多样,如专题性活动、课外合作游戏、帮助学生理清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疏导学生从沉闷的气氛中释放出来、注意用非语言的方式给学生一定的时间空间、注意观察,可以采用反馈技术,重复一些师生言行,引导学生,以及与学生平等相处,消除学生的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等。同时,也要注意教师(班主任)自身心理素质对学生的影响。

5. 要注重对具有自卑心理障碍学生的具体分析。其中,要特别注意小学生自卑心理的矫正。自卑心理又称为自我否定心理,表现为消极的自我评价,一旦形成和发展,对人的一生心理过程和个性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产生小学生自卑心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生理、智能、家庭、教育方式等。矫正小学生自卑心理的方法如下:了解他们的想法,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愿望;适当让他们接受一些小小的考验,增强他们自我承受心理;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他们自我优越心理,创造轻松环境,淡化其不安、烦躁、孤独、离群心理。

(作者单位:新建县长堽中心小学)

(责任编辑:李 霏)

(上接第39页)数额的参数基础上,突出了死亡损害赔偿的城乡差别,体现出户口歧视。

在笔者看来,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价值都是一样的,人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在同一个国家里,人的生命权是平等的,并无贵贱之分。公民享有的平等权也应体现在损害赔偿的平等上,不能因户籍之别剥夺彼此间的平等。因而,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虽然源于国家户籍管理中存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划分,但是,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对受害生命的赔偿和补偿中,支付“命价”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无论受害人身份、户籍如何,既然同为生命,就应该无贵贱之分,对其赔偿应一律平等。以户口性质对不同的受害人给予差别待遇,与宪法的平等精神不符,同时也不符合公平原则。

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制定出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断引起争议的今天,各地的司法实践将居住地、居住时间和稳定的收入作为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标准的做法是值得肯定与赞同的。笔者认为,随着户籍制度的变革和市场化大潮的冲击,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内涵早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因此受害人所能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应当以户籍或者居住地为基本依据,同时参考收入综合确定。对于不同种类人群受害人损害赔偿标准的界定,可以分为未成年人受害人、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身份的受害人、农村户籍的高收入人群、离退休的受害人、买取城镇户口但是并不在城镇居住并获得收入的受害人以及城镇无收入人群。通过综合的标准来计算,虽然使死亡损害赔偿的计算更加复杂,但却更贴合实际生活,也更可以体现法律所倡导的公平和正义。

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一是它有其严肃性和公正性,二是它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弱者利益。“同命不同价”的赔偿制度,简单地采用了“城乡差别”标准,既不尊重生命的平等价值,也不尊重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这种忽视公民权益的平等性、漠视公民生命的平等尊严的制度,如不尽快加以修正,将进一步加剧人群结构的尊卑分化,导致农民的身份地位在城市居民心中“贬值”,甚至还可能出现有人以为农民生命“便宜”而任意糟践。消灭赔偿制度的“城乡差别”,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这是所有生命的价值要求,更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权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 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 麻锦亮. 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新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3. 张继青. 同命不同价所引发的法律思考. 学习论坛, 2006(9)
4. 姚辉, 邱鹏. 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4)
5. 孙鹏. “同命”真该“同价”?——对死亡损害赔偿的民法思考. 法学论坛, 2007(2)

(责任编辑:黎 滢)